

· 生态文明建设 ·

论文明理论的发展与生态文明的提出

苗启明^a, 林安云^b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a. 哲学研究所; b. 图书馆, 昆明 650034)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文明理论与中国的文明发展问题,历经两个文明、三个文明、四个文明等发展到今日的生态文明并成为共识。文明的本质不能简单理解为改造自然的成果和进步状态,而应看做是对人的生存价值世界在生产和分配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衡量。这种合理性与合法性体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与平衡。传统文明作为人从自然界分离的产物,本身就具有非自然、反生态性,其极端发展导致了今日的生态危机。今日人类精神只有从类群伦理、国家伦理上升到世界伦理、生态伦理的高度上来,才能实施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生态文明的发展上来。

关键词:文明理论;人的生存价值世界;生态伦理;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 B82-05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2)05-0116-07

“文明”理论在我国的兴起,源于对20世纪的“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深刻反思。如何构建一个文明的社会,成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性任务。它由最初的“一个文明”的提法,经过3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四个文明”、“五个文明”的提法。本世纪以来,又逐步由对社会文明如何构建的分析,转向对生态文明的讨论与构建。这一思潮一直展示出一种既与社会实践发展需要相结合、又逐步深入的理论进展过程。

一、文明的内部区分

1978年,民主人士李昌有感于“文化大革命”的无知和野蛮,向党中央建议:应当进行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意见被中央采纳。1979年,叶剑英在建国30周年的讲话中,代表中央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建设。这一重要提法,显然是由哲学上的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统一的概括关系转化而来的。作为根据于哲学

的提法,显然有其深刻之处。于是,两个文明建设作为一种国策,推行了很长时期。这对拨乱反正、推进社会主义的社会文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1985年,苗启明首次提出制度文明这一范畴^[1],认为对于社会文明来说,仅仅从物质与精神这种二元对立的角度来理解是不够的。例如社会的政治制度,既不能划入物质范畴,也不能划入精神范畴,但它却是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体现。一个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关键在于制度,因而提出应当把社会文明划分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三维结构。

对文明的二维划分局限一旦被突破,一时间“行为文明”、“政治文明”、“权力文明”等都相继提出。1987年,钱学森等从政治学视角强调“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2001年,江泽民从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实践的角度,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并把它与“民主政治”相提并论。2002年,党中央正式提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收稿日期:2012-06-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12XKS023)

作者简介:苗启明(1939—),男,河南济源人,研究员,从事马克思生态人类学哲学思想和生态文明问题研究;林安云(1964—),女,安徽黄山人,副研究员,从事生态文明问题研究。

明”三个文明建设。它虽然不是同一学科的概念,不能并列,但它是社会实践的三大要求、三大要点,是社会发展的三大方向的概括。这当然是理论上和社会实践上的重大进步。但是,制度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关系是什么?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两个概念虽然不同,但其所指的对象和用意都是相同的。所以,有人指出:“文明是一个大的系统……它是由物质文明、制度文明或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部分构成的。”

2004年,栾贻信、袁俊平^[2]在书中,一方面坚持了“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划分,一方面吸收了学术界日渐重视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明”,提出社会文明由生态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构成。把社会文明的三维结构置于生态基础之上,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纳入社会文明的思考和建设范围内。这是文明研究的又一重要进步。

在思考了上述各种观点的合理性与不足之后,一种新的综合成了可能。从今天的生态立场来看,社会文明是由生态—技术文明、物质—财富文明、制度—权力文明、精神—规范文明、生活—行为文明五个层次构成,它们形成了一种五层双质结构^[3]。这不仅是对于已经提出的各种“文明”的综合,更是从社会系统的层次结构上对文明内在成分的深入分析。只有从这种深入细致而又相关的区分出发,才能深入考察各层次的生态性,为构建生态文明奠定理论基础。

二、文明的内在本质

文明概念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过去一般把它作为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进步程度的衡量。从今天的生态立场看,文明应当是对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和人与人的生态关系合理化程度的衡量。要能够对此进行正确的分析,就要引进一个新的范畴——人的生存价值世界。一般讲来,人总是要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运用自己的“本质力量”,创造对自己、对族类的生存发展有意义的生存价值物。由这种生存价值物所组成的世界,称之为“人的生存价值世界”。除了自然界直接提供的自然生态环境如地域、温度、空气等等之外,它一般既是人的生命与自然物相互结合的产物,又是人的生命赖以生存发展的依赖物。它显然囊括了人的一切有利于生存发展的价值创造,包括生态选择的、技术的、物质的、制度的、权力的、精神的和生活行为的方方面面。因此,文明分析要能发挥实际作用,就要紧紧抓住这个世界。文明,就是对人的生存价值世界的创造与分配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审视。这种合理性与合法的最

高境界,是在生产方面的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在分配方面的人与人的和谐。这一视角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人所创造的生存价值世界,作为对于生硬的自然界、对于人自身的天然的野蛮和无知状态的改变和超越,是以科学技术文化规范的形式,对于人们自身生活的合理构建与健康规范。它有三大要点:第一,它是人所选择、所占有的天然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这是由地球在几十亿年的发展中准备好了的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这在今天已大体形成为固定地域的国家共同体,但它们共同利用着地球这个生态系统;第二,它是人以自己的本质力量通过劳动生产与自然资源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上有个符合不符合数理、物理与生理的问题,有个生态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即生态公平与生态正义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才会有物质—财富创造的合理性合法性问题;第三,它作为一定共同体的人们通过社会的分工合作共同创造的生存价值世界,是一定人们赖以生存发展、赖以生活消费的物质基础。所以,人人都要占有一定的足以合理生存的份额。这种占有和分配,有个符合不符合人理、心理和事理的问题。而人理、心理和事理的准则不是别的,就是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问题。

重要的是,公平正义不仅是社会领域的合理不合理、合法不合法的问题,对于今天的生态文明来说,人们已把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中的公平正义,推广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即生产和交换上的公平和正义,从而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些社会基本经济环节内,都要求坚持公平与正义。因此,分析“文明”,就是要分析它在一定历史时代中所达到的公平正义程度,即合理性合法性程度,以及由其所体现出来的人的自由解放程度。文明的深层本质,就在于人们对他所创造的生存价值世界的“生产和享用”是否达到了最大的合理化与合法性,即是否达到了时代所要求的公平与正义,是否符合这一最大的事理人心。所以,合理性合法性是文明的本质特征。质而言之,所谓文明,从直接性上看,是指人对自己在自然界中生成的生存价值世界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方面所达到的符合自然人心的程度。从间接性上看,是指人所创造的世界符合物理与事理、符合人理与心理的深度与广度,是指这个人化世界的合生态性即合理性与合人伦性即合法性在历史发展中所达到的进步程度。符不符合自然人心,是文明不文明的标志。因为,只有建立在这种合理化与合法性程度的基础上,人类才能实现其合理生存、健康发展与不断走向自由解放。所以,文明就是指人在自

然世界与社会世界的规范中所达到的合理生存、健康发展与不断走向自由解放的程度。那种破坏自然生态或人伦生态的科技、财富、成果、进步,再丰富也是不文明乃至反文明的。以上,是对文明的正面性质的概括。此外,文明还有负面效应,即非自然、反生态的一面,对此后面再述。

总之,文明是人所构建的人与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互济的生存发展状态。它在本质上是人在自然的良性生态环境中所构建的良性的社会生态存在。

三、文明的合生态性与反生态性

但是,人类文明的出现,既是人与自然界的生态关系的一种合理结果,因而它与自然生态有相适应的一面,又是非生态和反生态的一种人为创造,因为文明就是从人与自然界的天然生态关系中走出,创造一种自然生态中所没有的新的存在,它与自然之间的生态联系发生了中断,出现了界线,如果人们不主动构建这种生态联系,就会出现生态鸿沟和生态陷阱。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来看,人类文明从人与自然界的天然生态关系中走出,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今日不得不开始生态转身,返回向生态文明方向发展。这种发展就是人类文明的反生态发展的一种逻辑回归。

原始文明大约是 10 万年前形成的采集—狩猎文明,采集、狩猎是人类从动物界带来的最早的文化—技术生存方式。它建立在人与自然界的直接的物质交往的基础上。因此,人对自然的基本态度,是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来敬畏、讨好、顺从,并以狡黠的巫覡方式加以掌握。人也认为自己是某种动植物的一部分(图腾),加上以原始的“以己度物”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人们形成了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并在这一观念支配下,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基本上属于天然性的物质变换,以实现自己的简单生存。这是文明,但还是在野蛮状态下的文明,自然生态统治下的文明。但已有一些非自然、反自然的成分,如以人为栖,划地为居,烧陶,一定程度上对自然的破坏等。但在这种野蛮状态下的原始文明中,人发展了自己的体质和人作为人的人类学特性,并孕育出了农耕文明。

农耕文明大约发生在 1 万年前,是人以一定的知识、技能和生存文化与自然事物的特征相结合而形成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直接建立在土地开垦和草原利用的基础上,从而走向与自然生态不一样的道路,形成了人的真正的在自然基础上的生产。有了生产,人类就开始在自然生态的基础上构建和形成自己的日益有效的社会生态

系统。于是,人们凭借自己的社会生态系统而生存,并在这个社会系统中创造人的新的生存价值世界:创造了城市、手工业和简单矿业为主的生存形态。但是,当人以这些东西形成自己的社会文明时,一种非生态、反生态的东西也就成长起来,这就是地市。

“城市”开始了人自己的文明生活,建立了人自身的社会生态系统,但是也使人与自然界的直接生态关系开始断裂,它是人与自然界生态分离的起点,而城市的大小表明了这种分离的程度。“手工业”集中了人的技术手段,也是人与自然界开始分离的手段,技术则打开了人与自然界分离的道路。如果说,作为人的主要生存手段的开垦和畜牧,开始了人对自然生态的地表系统的侵犯和改变的话,那么,最早的“矿业”就已开始了人对地内生态资源的侵犯和改变。但是不论如何,农业文明还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直接交流的基础上的,自然界通过人的生产活动流入人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形成人的生存价值世界。它们在人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循环,大部分通过消费又返回到自然生态系统中。它表明,人与自然界之间还不是单纯的熵增过程,它同时还存在还原性的负熵过程。

但是,就社会生态系统而言,农业文明随着土地的开垦开始了人们大量占有物质财富的过程。这种占有最初是集体占有,随着占有的富集和人自己的分裂而开始了私有化的进程。这种私有化作为一种人的欲望与财富力量的结合,成为一种既超越自然力量、又超越人的力量的独立的社会物质力量,它成了主导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以及人与人的物质变换的决定性力量,从而文明的发展同时成为反生态不文明的发展,也开始了社会中的不文明关系。因为,这种独立力量在财富垄断者手中,就转化成为一种既奴役人、又奴役自然界的异化力量。因为奴役就是侵犯,侵犯就是伤害,伤害就是异化,异化就是反文明。随着农业文明阶段的发展深化,这种基于财富的扩大而形成的对人、对自然的侵犯伤害力量也就越大。这种力量的制度体现,就转化为社会权力,对土地财物的权力和对人的权力,其最高体现就是贵族阶层和帝王的形成。由于这批人的生活不直接依赖于自身的能力,而是建立在由他人劳动所形成的财富的基础上,并且为了财富的扩大而出现了横征暴敛,战争劫掠,以及浩大工程、花天酒地的生活,从而使社会生态系统开始了熵增过程,而熵增就是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侵犯。所以,在农业文明时代,人就由于反生态的发展而造成地球表面的生态退化。这种由于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伤害而

反过来又恶化了人类社会的生态系统的情况比比皆是。

工业文明大约发生在 300 年前,它是人类的反生态活动的深入发展。工业文明的主要生存手段:一是以人造机械和人造力量为基础的工业(包括机械化的农业)开始了一种非生态的文明构建;二是通过科学技术与自然物种的特性的结合,而深入自然并改变自然的天然构成;三是来自地底的矿物能源和金属资源,被大量翻出参与和改变地表生态循环;四是以机械和化学为手段的人造物成了地球上新的反生态物种;五是工业群落和大城市的崛起直接建立起了与自然生态对抗的文明世界;六是伴随这一切和财富的增加而出现的人口爆炸,它超过了自然生态的承受能力;七是人把自然界当成一个可以进行无限掠夺破坏的对象,构建了与整个生态为敌的反生态的生产、生活系统,这是一种以自然生态为原料而维持运转的人为的反生态文明。自然向它注入的是负熵流,它向自然返回的是正熵流,从而形成了一个不可持续的天人对抗的反生态系统,终于形成了今日的天人紧张关系——天人生态大危机。

在工业文明中,出现了一种统治一切的反生态的资本,这是人的欲望与物力的结合,它不仅控制了整个工业生产,也控制了劳动生产者。它为了自身的增值,一开始就让劳动者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出现了空前严重的阶级对立。另一方面,资本又为资本家所有,资本家无限增值资本的欲望成了资本本身的增值动力。从此,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为了创造可以使资本增值的交换价值,这就由满足有限需求的生产,转化成了满足资本无限膨胀的生产。资本一方面通过其商品形成和打开了世界市场,另一方面让广大生产者也变成消费者,再加上人口的膨胀,从而使工业这个人造的、本来就只能促使自然界增熵的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系统,千百倍地加重了自然生态的负担,使生态灾难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爆发,形成全球性的、全人类性的生态危机。这才使人们警觉和反思,发现对人类作出了最伟大贡献的工业文明,由于违背自然生态系统的规律反过来危及人类本身和整个生态系统的生存。如不及时扭转,足以断送人类自身的存在。这便是“生态觉醒”:原来,科学和理性深入到了自然事物的细微深处,但在人类与整个自然界的生态关系这一大问题上,却一直是个被资本遮盖了的盲区,正是这一层反过来教训了人类。

人们终于明白,整个工业文明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就是这种文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侵犯、伤害即熵增过程。人类今天虽然发现传统工业文明是

一种生态陷阱,但却不能不依然在走着这条断送未来生存的道路。这就是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生存悖论和发展困境。而突破这种悖论和困境的,只能是摆脱和超越这种建立在破坏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之上的传统工业文明,创建和发展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规律之上的新型的生态文明。在传统的追求道路上继续下去,人类只能迈向死亡;改弦更张,实现生态转向,或许还有光明可谈。这是我们在讨论生态文明之前,应当明白的关于文明为何物和文明的历史发展的理论前提。

四、既往文明的负效应与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

人类迄今所创造的文化和文明,都是通过非自然、反生态的道路而构建起来的。这一点直到今天还没有被人们完全意识到。事实上,文明或者说人类文化从它诞生的时候起,作为人与自然界在社会中的产物,就既有顺应自然、符合生态的一面,又有违背自然、不符合生态的一面,因为文化和文明都是对自然界的“人本化改变”的产物,这是人作为“属人的存在物”、作为在自然界自谋生存的存在物的必然。所以,文化和文明,在天人关系上从一开始就是辩证二重性的。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自然界的人化”,表明这种辩证二重性是它的生成本性。一方面,我们应当看到,人所创造的文化和文明,作为人自身依存于自然界的生存形式,有它的自然依赖性。例如,人类今日的社会物质生活的原材料都来自自然界:能源的 95%、工业原料的 75%、农业生产资料的 70%、饮用水的 30% 都来自深层自然界,人类文明建立在地球的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农田水利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这四大生态系统之上。但是,人类文明作为支持人的社会生存的系统,是一个生产—消费系统,而生产对于自然界来说也是一个通过粉碎而进行物质变换的资源耗费系统,因而它对于自然界来说是一个耗散系统。而且它作为人本化的人化物,以粉碎自然、切割生态、改变自然为前提。人类文明的发展,特别是人口规模与生产规模的不断增长而庞大化造成了自然界的空洞化、破碎化、垃圾化即熵化,所以,文明以自然界的空洞化、破碎化、垃圾化、熵化为代价,特别是传统工业文明,是非自然、反生态的。

文明之所以会有非自然反生态的一面的原因:从社会方面说,人类行为不是对于自然条件的直接反射,而是通过自己的观念和意识构想之后在头脑中形成一种行动方案而行动,它是思想意识的产物,受观念所左右,这种意识构想性就是它

的非自然性的根源,也给了它反生态的可能。它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从物质基础上说,文明建立在对自然生态的物质粉碎和重新组合构建的基础上,即以消解自然生态的负熵流为前提。

其二,是自然的有机统一性与文明的孤立割据性。自然界的一切环节都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但人只是依据自己的某种需要而占有某物,把它从自然界中孤立割据出来而拥有它,从而破坏自然界的有机性和生态性。

其三,是自然的生态价值性与文明的功利价值性。自然界的事物作为有机体,其每一种都有它的生态价值,用马克思的话说,自然事物是“互为对象”而存在的。但人对它们的占有,仅仅服从于自己的功利目的,有功利的就是有价值的,而几乎完全不考虑它本身的生态价值。这就违背生态,破坏生态。

其四,是自然界的多样化与文明的单一化。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生命的保障,而人类不可能像自然界的多样性那样占有自然,它只能就自然界对人有用的那一点而片面地、单一地占有自然。生态学的规律是多样则生,单一则亡。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不能不片面化单一化,这就走上反生态道路。

其五,是自然界在生态上的循环和平衡性与文明在生态上的断裂和倾斜性。整个自然界都处在大气循环、水循环、氮氧循环以至生命的循环之中,并在这种循环之中取得生态平衡,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但是,人筑起大坝,建起城市,把土地的有机物集中到城市又排入江河,创制许多自然界所没有的东西混入土地,造成自然生态的断裂和倾斜,不这样人就无法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

事实上,以往任何技术都是非自然反生态的。它不是自然界的产物,而是作为人造物、作为改变自然的利器而出现的,技术的积累和构建一般只能在其非自然、反生态方面的积累和构建,因为这是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文明作为人所创造的适应人类生存发展的舒适家园,是对于自然环境的非人性的对抗,因而不能不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恩格斯早就看出了文明的这种非自然、反生态性。他指出:“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土地荒芜和温度升高以及气候的干旱,似乎是耕种的结果。”^[4]美国生态学家罗尔斯顿也指出:“文化是为反抗自然而被创造出来的;文化和自然有冲突的一面。每一个有机体都不得不反抗其环境,而文化又强化了这种对抗。生活于文

化中的人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5]⁴⁵¹ 他指出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这种既顺应自然又反自然的关系:“我们重新改变了地球,使之变成城市。但这个过程包含着某种辩证的真理:正题是自然,反题是文化,合题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5]⁴⁵¹

但是,如果这些文明能够有意识地保护他们的森林,保护他们的水源,不肆无忌惮地征伐掠夺,或许不至于出现这种生态灭亡。所以,文明的非自然、反生态性,在人类的有意识的关注和控制之下是可以避免的,正像人们可以创造文明和文化一样,人类也可以创造和构建适应生态环境要求的生活。只要人类家园不超越生态环境的生态容量,伟大的自然界就可以包容人类家园而不失其生态功能。正是这一层给我们今日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希望。

认识到传统的文化和文明的非自然、反生态性非常重要,即它的任意发展必然导致地球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和毁灭。如果说,以前人类还没有出现“生态自觉”因而造成了生态危机的恶果的话,那么,人类今后要想持续生存,就不得不约束和克服其反生态性,按照伟大的生态规律重新改造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这就是生态文明的构建。而生态文明要想成功,人类在精神理念上就必须来个彻底的改变,即把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扩大到整个地球自然界,以生态伦理观念来支配自己的一切。因为,人的生存发展活动作为一种优化系统,是由其精神意识来支配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与其伦理精神的发展分不开。从总体上看,人类伦理精神的发展可以说已经经历了五个阶段:即建立在个体伦理基础上的家庭伦理、类群伦理、国家伦理、世界伦理(人类伦理)向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的发展^[6]。在氏族、部落时代,人靠同群同类的家庭、氏族和部落的保护而生存,这一层决定了人的伦理精神以家庭伦理、类群伦理为本位。国家的出现,使人们超越了血统联系,人的生存发展从大范围上说依赖于国家的保护,这就使伦理精神上升到以地域的经济政治联系为主的国家的层次上来。于是,国家伦理观念发展起来。以国家伦理为本位,是人类精神的一次极大的提升,它超越了家庭伦理与类群伦理的狭隘心理。但是,国与国之间是互不承认的,每个国家都想扩充自己而覆没其他,因为一个国家的人不可能直接依靠别国而生存发展,除少数互相依赖的国家之外,国家之间迄今为止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所以,每个国家都想扩展、吞并。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一般是不道德的,特别是侵略性国家(其最终结果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对于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来说,其公民不能不陷入尼布

尔所说的爱国主义的道德悖论:公民以牺牲个人这种无私的道德精神,换来的却是其国家的利己主义的不道德,侵略他国、加害于他国的不道德。所以,国家伦理在国与国之间出现了人类的悲剧,它的局限也就不能不暴露在世界面前。而也正是这一人类悲剧的重大教训,使人们意识到承认和尊重别国的存在是自己生存的前提,加之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扩大,迫使人类进入了“世界历史”时代,于是,二战之后世界伦理即人类伦理精神便发展起来,它表现为基于国家伦理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能再公然盛行,世界性的非殖民化,世界性的民族独立,是世界伦理即人类伦理走向前台的表现。正是世界伦理的高涨,世界进入了和平、发展、环境与合作时代。但是,世界伦理虽然日渐盛行,但还没有进展到以世界伦理、人类伦理为本位的时代。所以,一方面人类开始进入全球化时代,一方面国家伦理还潜在地发生着决定作用,例如,在这个生态危机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伦理,使他们在对本国的环境和资源严加保护的同时,疯狂掠夺不发达国家的资源,并把污染转嫁到不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作为国家伦理的扩大形式的“主义伦理”又在划分着世界。虽然如此,人们还是认识到,任何国家都有不容侵犯的生存权利,承认别国的和平与生存,是自己和平与生存的前提。但是,只强调世界伦理即人类伦理也有它的局限:它只注重人类自身这一物种的生存发展,而把自然界视为任人宰割的对象。其结果是生态灾难的暴发,它惊醒了人们的无限发展的春梦。因此,自20世纪中期以来,先进的人们开始了生态觉醒,到五六十年代,人们终于开始普遍意识到,人的生存发展不能不依赖于自然界,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它关系到“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健康生存。美国生态学家莱奥波德首先认识到,各种生物(包括人类)和无机自然环境组成大地共同体,其中每种事物都是一个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不可分割的活的存在,从而把包括人在内的大地视为一种生存机能的整体。于是,生态伦理便首先以“大地伦理”的形式发展起来,现今人类已进入生态伦理或者说环境伦理时代。虽然还未能上升到以生态伦理为本位,但人类终究会上升到以世界伦理、生态伦理为本位的时代^[7]。生态文明,便是人类自觉走向以生态伦理为本位并把生态伦理转化为实践力量的生态伦理实践时代。只有以生态伦理实践为本位,人们才能逐步走上生态文明的道路。

生态伦理的觉醒是人类超越自身的动物界限的觉醒。在生态觉醒之后,人们才知道,人作为自

然存在物,不过是整个地球生物圈共同体中的一员,不过是自然生态、自然物种中的一员,但却是一个有自觉意识、自我控制力的一个物种,因而,人的生存发展不仅仅由人自身所决定,它还必须受自然系统的整体规律所支配。因而,人的生存发展必须遵守生物圈的自然规律即生态规律而活动,否则,人类作为一个自然物种就无法合理生存。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中就已经认识到这一层,它提供了一种生存伦理方案,“其核心是从整体上看人,从人的生活的连续性看人的生活。它要求我们用尊重自然的态度取代占有自然的欲望,用爱护自然的行为取代征服自然的的活动,用人类对自然的自觉调节取代自然本身的自发演化,用保持自然之统一的情感取代瓜分自然的恶劣行径,用对自然的责任感、义务感取代对自然的统治和掠夺,用适度消费取代无度消费,用节制生育取代放任生育,用经济的有机增长取代经济的盲目增长。”^[8]

正是这样的生态伦理精神,催生了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是建立在生态伦理精神基础上的新的文明形态。它需要人的伦理精神由类群伦理、国家伦理进一步上升到世界伦理和生态伦理上来,并以生态伦理精神支配每个人与一切人,才有可能建立新型的生态文明。类群伦理、国家伦理,不管原来如何伟大,在生态伦理时代都不能不退居从属地位。污染转移、资源掠夺、生态帝国主义,都不过是类群伦理和国家伦理在生态伦理时代的不良表现。想在生态上独善其身,而让污染远离自己的国土,最终只能反过来危及自身。它需要全人类一致行动,使生态伦理走上主导地位,生态文明才有可能构建起来。

那么,生态伦理和建立其上的生态文明,能不能克服文明的反生态性呢?其可以肯定的回答在于,在生态伦理出现以前或实施之外,人类文明作为一种社会优化系统,它的优化仅仅是在社会系统之内的优化,而不涉及自然界,因而不能克服其反生态性。而一旦人类能够把自己的优化活动扩大到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包括无机自然界在内,那么,其优化也就相应地走出人的社会系统之外,而扩大到整个自然界,形成“人一境生态系统”,这就有可能克服其反生态性。因为优化是建立在人的意识、智慧及其创造和变革之上的,创造可以超越自然,变革可以顺应自然,包括改变人自身的自然、人自身的恶劣本性,从而有可能构建适应自然生态要求的“人一境生态优化系统”,把非自然、反生态性降到最低水平,构建出既符合自然生态的数理、物理和生理,又符合人和人类社会生态的

事理、人理和心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新文明。这种文明以顺应自然和人心的生态要求为前提,这就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既要改变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生产)的不合理性,又要改变人与人的物质变换(分配)的不合理性,既追求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又追求人与人的和谐发展,这就是构建以人与自然界的和人与人的合理物质变换为前提的符合生态原理的新世界。

参考文献:

- [1] 苗启明. 论社会主义文明的三维结构[J]. 河北学刊, 1985, (6).
[2] 栾贻信, 袁俊平. 社会发展精神特性论[M]. 北京: 文

化艺术出版社, 2004.

- [3] 苗启明, 刘天才. 双质五层结构: 社会文明的完整形态[J]. 学术月刊, 2006, (1).
[4] [德]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371.
[5] [美] 罗尔斯顿. 环境伦理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6] 郝克明. 面向 21 世纪: 我的教育观[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391.
[7] 刘思华. 论以生态为本位的科学依据与理论框架[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2, (4).
[8] 张云飞. 罗马俱乐部的生态道德观评述[J]. 道德与文明, 1989, (5).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Proposi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IAO Qi-ming^a, LIN An-yun^b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b. Library, Kunming 65003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re has been more and more concern about the civ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fter experiencing the propositions of two civilizations, three civilizations and four civilizations, the civilization theory has today developed in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become a consensus. The essence of civilization cannot be simply interpreted as the achievements and advancement status of transforming nature, but rather it shall be to measure the rationality and legitimacy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world about the value of human survival. The rationality and legitimacy is reflected in the harmony and bala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man and man. Traditionally, civilization is viewed as the product of human separation from nature which in itself is non-natural and anti-ecological, and its extreme development has resulted in today's ecological crisis. Today, only human spirit can be upgraded from the group ethics and national ethics to the level of world ethics and ecological ethic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ordinating with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n be implemented.

Key words: civilization theory; the world about the value of human survival; ecological ethic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王 春]